

外国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效应：理论、实证分析及趋势预测

高宇宁 何明科

摘要：本文首先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趋势，并建立了其总量的修正指数曲线及组成比例的马尔科夫过程的时间序列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其总量及组成情况的发展与变化作了实证分析并对二者未来的发展做出中短期预测。结果表明，我国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将进入以独资为主体的利用外资的“第三次制度变迁”。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制度变迁 趋势分析 预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中国的13亿人口更构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市场。面对如此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巨大诱人的市场，各类境外资金纷至沓来，寻求发展机遇。

我国年度实际利用外资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10亿美元跃升至1998年的468.78亿美元，年均增幅约28.7%。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名列第二的外资流入大国。

然而，我国吸收利用外资也并非一帆风顺，1999年我国年度实际利用外资便首次出现了下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吸收利用的外资中，合作、合资、独资以及合作开发项目等4种类型所占的比例也在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与程度二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日趋完善分不开的，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制度变迁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总量与组成的影响，并据此对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一、理论分析

根据传统的外资理论（如Heckscher-Ohlin-Samuelson模型），外商直接投资被看成是资本由低收益率的国家（地区）向高收益率的国家（地区）流动的套利行为，且通常意义上是由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然而，现今世界上外资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却是发达国家。因此，我们无法忽视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框架不完善带来的巨大的“交易成本”对这种“套利行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受到了管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实际上，流向我国的外资在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增长正是建立在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及法规体系等制度框架的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的，其数量变化显然已经无法用资本回报率的变化来加以解释。为此，有必要从制度变迁的一般性过程对我国外资的发展加以描述。

在诺斯（North）的制度变迁模型中，“第一、第二行动集团”的行动将制度变迁的过程划分为不均衡——均衡的演变过程。所谓“第一行动集团”是指其决策支配制度创新进程的决策单位，一般来说其成员至少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而在我国还应包括直接参与相应政策制定的政府部门；而

“第二行动集团”是指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收入进行制度变迁安排的决策单位，这里潜在的含义一般是指行政和立法机构，而在我国还应包括制定周边的制度框架的政府部门。判断两者的依据是：“第一行动集团”可以使所有的追加收入自然增长，而“第二行动集团”仅能做出一些能获得收入的策略性决定，却不能实现该种增长。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即具有制度变迁行动能力的“第一、第二行动集团”）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的“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其来源有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带来的外部利润，外部利润内部化，克服对风险的厌恶，市场失败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之所以和境外投资者“一拍即合”，双方自然都有自身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与企业这一系列“行动集团”想要将原本挡在国门之外的“潜在利润”内部化；而境外投资商这一“第一行动集团”的成员则对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在规范化、风险降低之后的潜在获利可能心动不已。

根据以上的定义与描述，制度变迁的一般性过程可被描述为：“第一行动集团”形成并预见到潜在利润，之后提出新的制度方案并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出发，选择“最优方案”加以实施。然后，“第二行动集团”形成并与“第一行动集团”一道努力促进制度创新。在新制度成为现实中的制度之后，两集团会就所获得的、曾经是潜在利益的收益进行再分配。

二、模型建立

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进程可以说是“不均衡—均衡—不均衡”的循环变化。对于外资来说，“交易成本”在制度的不均衡阶段成为了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最终结果就是，“交易成本”的总体比较为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依据。而对于迅速增加的国内吸收外资的主体，相对稀缺的外资是其由简单的政策优惠向配套的制度创新过渡的动力。资源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成为最重要的外生变量。这二者促使新的产权规则出现，从而促进经济出现新的增长，这一阶段我国利用外资金额应当呈现出由较低水平开始的高速增长态势。

而在制度变迁逐渐进入均衡阶段后，无论是产权制度还是市场规范都逐渐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交易成本”由开始的高水平逐渐下降。此时，愿意进入中国的外资逐渐增

多,而相比之下吸收外资的主体的增长在制度去向均衡后逐渐放缓,外资的相对稀缺性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流动的外生与内生动力皆已不如先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第二行动集团”及“周边”“搭便车”的利益集团开始通过再分配分享所有的追加收入,经济进入一种相对平稳的增长,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利用外资金额应当呈现出在较高水平上的低速增长。

用模型形式表述如(1)式所示:

$$y=c+y_0 \times (1-e^{-bt}) \dots\dots\dots (1)$$

式中:y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估计(拟合或预测)值(亿美元);t表示时间,对于建模开始年份,t=1,以后逐年累加1;b为指数,一般b<0;c,y₀为常数。

值得注意的是,当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开始注意到新的“潜在利益”的时候,制度变迁将进入另一个不均衡阶段。而常数c+y₀所表征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利用外资的上限值。

对于外资组成的变迁,笔者认为与产权的所有权诉求密不可分。张五常将产权具体划分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是以充分的收入享受权(如企业所得税的大幅减免)来满足外资对于资本收益率的要求的。但在制度变迁进入均衡阶段后,外资对于所有权的要求必然由于“交易成本”及风险的降低而浮现。因此,我国外资的组成必然是由以收入享受为主的低风险敏感的投资形式(合作、合作开发)向以所有权为主的高风险敏感的投资形式转变(独资),而通常还会有一种或几种“中间”形式作为过渡(合作),其转移的主要形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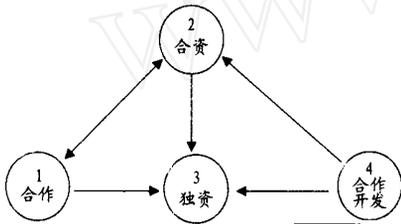


图1 外国直接投资(FDI)组成转移主要形式示意图

这一过程可以用以下转移矩阵来表征:

$$\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a_{13} & a_{14} \\ a_{21} & a_{22} & a_{23} & a_{24} \\ a_{31} & a_{32} & a_{33} & a_{34} \\ a_{41} & a_{42} & a_{43} & a_{44} \end{bmatrix}$$

其中 a_{ij}表示投资形式 i 向投资形式 j 转移的概率。

三、实证分析及预测

1.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发展变化趋势

自从1979年我国出台了首部《中外合资企业法》以后,进入我国的外资便逐年迅速增加(见图2)。在衡量外资利用情况的时候,由于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是当年能够对经济做出实际贡献的外资的度量,因此我们通常将其作为考察指标。仔细观察图2,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在1984年(增长率98%),1992、1993年(增长率152%和150%)和1999年(下跌11%)分别有两次飞跃和一次下滑。那么,我国外资利用发展历程中“两次飞跃一次下滑”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使之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呢?笔者认为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吸收外资的两次“制度变迁”以及国际投资形势变化使然。从我国吸收外资总量的发展与变化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1979-1982、1983-1991和1992-2000三个阶段分别来建立模型进行研究并做出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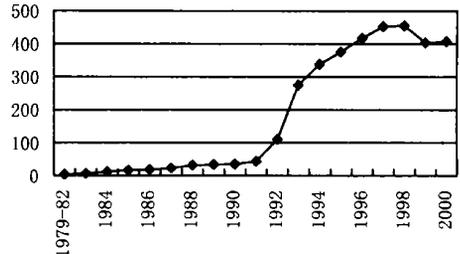


图2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曲线(单位:亿美元)

根据上文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变迁的阶段性过程的特点,我们拟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Non-Linear Parameter Estimation, NLPE)分段建立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时间的修正指数曲线模型。从式(1)可以看出,此模型有3个待定系数——b、c和y₀,表达式又是非线性形式,因此须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求解。通常都是求其最小二乘解,即利用最优化方法找出一组系数,使得观测值与拟合值之间的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求得这组系数后,即可确定模型的最终形式。

我们对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序列分两段分别建模:第1段为1983-1991年,取9点建模;第2段为1992-1998年,取7点建模。分段建模得到的两个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列出于表1。利用这两个模型所做拟合与预测结果分别列于表3和表4。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两个模型中除起始端点拟合稍差之外,序列后面所有各点的拟合均较为良好。作为对模型的检验,我们在分别舍弃两个模型起始第1点的条件下,分别检查了两个模型的剩余标准差S,平均相对残差和拟合优度R²(见表2)。由此可见,所建两个模型拟合良好,是可以被接受的,并且可进一步被用作中短期预测。

表1 分段建模时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No.	年份		建模点数 n	参数估计值		
	起	止		c	y ₀	b
1	1983	1991	9	-6.50	63.50	-0.1495
2	1992	1998	7	0.47	503.53	-0.3524

表2 分段建模时模型之检验结果

No.	年份		检验点数 n	剩余标准差 S (单位:亿美元)	平均相对残差 (%)	拟合优度 R ²
	起	止				
1	1983	1991	8	2.96	9.69	0.9637
2	1992	1998	6	12.63	2.60	0.9871

如果将表3和表4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估计值同时点绘在一张图上(图3),将可以看到每一个模型的估计值都有它自己的渐近线:

$$y=y_0+c \dots\dots\dots (2)$$

表3 模型1的外国直接投资拟合与预报值
(单位:亿美元)

No.	年份	FDI		残差	相对残差 (%)
		实际值	预报值		
1	1983	6.36	2.32	4.04	174.49
2	1984	12.58	9.91	2.67	26.95
3	1985	16.59	16.45	0.14	0.87
4	1986	18.74	22.08	-3.34	15.12
5	1987	23.14	26.93	-3.79	14.07
6	1988	31.93	31.10	0.83	2.66
7	1989	33.92	34.70	-0.78	2.25
8	1990	34.87	37.80	-2.93	7.74
9	1991	43.66	40.46	3.20	7.90
10	1992		42.76		
11	1993		44.74		
12	1994		46.44		

表 4 模型 2 的外国直接投资拟合与预报值

(单位:亿美元)

No.	年份	FDI		残 差	相对残差 (%)
		实际值	预报值		
1	1992	110.07	150.03	-39 .96	26.64
2	1993	275.14	255.17	19.97	7.83
3	1994	337.66	329.07	8.59	2.61
4	1995	375.20	381.03	-5 .83	1.53
5	1996	417.30	417.55	-0 .25	0.06
6	1997	452.57	443.23	9.34	2.11
7	1998	454.63	461.28	-6 .65	1.44
8	1999	403.19 *	473.97	-70 .78	14.93
9	2000	407.15 *	482.89	-75 .74	15.68
10	2001		489.16		
11	2002		493.57		
12	2003		496.67		

说明: *1999和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值并未用来建模,仅供作比较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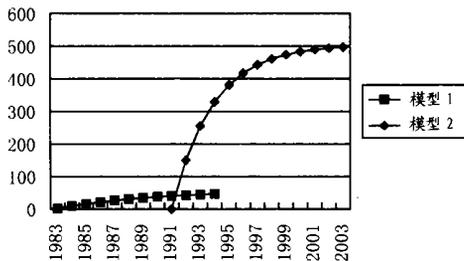


图 3 两个模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拟合与预测值曲线(单位:亿美元)

即 y 值最终会逼近 $y_0 + c$, 呈现出“饱和状态”。不难算出,两个模型的“饱和值”分别为 57.00 和 504.00 亿美元。也就是说按照模型 1 的发展趋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将不会超过 57 亿美元。表 3 依照模型 1 给出的 1992-1994 年间的预测值仅有 42.76,44.74 和 46.44 亿美元,而实际达到的却分别为 110.07,275.14 和 337.66 亿美元。这是由于 1992 年以后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均衡”阶段,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按照新的模型 2 发展,出现陡升,产生了飞跃的缘故。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制度变迁进入到“均衡”阶段后,应当寻求“制度创新”,从而促成外商投资的新热潮。这在第二次制度变迁逐渐进入均衡阶段后尤为重要。

2. 实际利用外资组成的转移变化趋势

合资、合作、独资和合作开发始终是我国利用外资的 4 种基本形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它们各自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它们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中所占的比例在这一期间却发生了显著而巨大的变化(图 4)。从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到,投向合作类企业资金的比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近 40% 逐渐下降至 90 年代中后期的 20%; 反之投向独资类企业资金的比例则在 80 年代一直在 10% 以下,进入 90 年代后迅速成长(2000 年跃居第一位); 而投向合资类企业资金的比例呈现出峰形:在 80 年代一路攀升,至 1987,1988 两年甚至超过 60%, 到 90 年代末跌至 40%。投向合作开发项目的资金虽然在 80 年代初中期占据了 40% 以上,但至 90 年代中后期基本维持在 1~2% 的低水平。

由统计资料可以看到:我国吸收外资的组成,即在所吸收的外资中,合作、合资、独资以及合作开发等 4 种类型在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例逐年有较大的变化。对于这类组成变化发展的分析研究,有许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可供选择。本文拟采用转移概率来进行分析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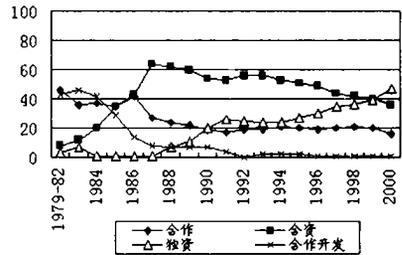


图 4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组成变化(单位:亿美元)

外资组成中有 4 种“状态”,它们是离散的。另外,统计资料中时间是逐年给出的,也是离散的。一般地说,商业投资行为往往由当前的实际投资环境决定,而与以往的历史情况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后效性”较小甚至全无。因此,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组成的时间序列有较大可能是一个马尔可夫(Markov)链,并可用转移概率矩阵表征投资者在各个状态间的投资意向及其转移趋向。

我们取 2 年作为转移的“一步”,利用统计资料,采用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ming, LP)方法估计出 1988-1998 年间的一步转移概率矩阵,经归一化处理,即使得每一行的各概率之和为 1,结果列于式(3):

$$\begin{bmatrix} 0.6907 & 0.0346 & 0.2746 & 0.0000 \\ 0.0859 & 0.8631 & 0.0000 & 0.0511 \\ 0.0227 & 0.0000 & 0.9736 & 0.00365 \\ 0.0000 & 0.5283 & 0.4239 & 0.0477 \end{bmatrix} \dots\dots\dots (3)$$

对一步转移概率矩阵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各“状态”,即实际利用外资组成中 4 种类型间的主要“旋回”(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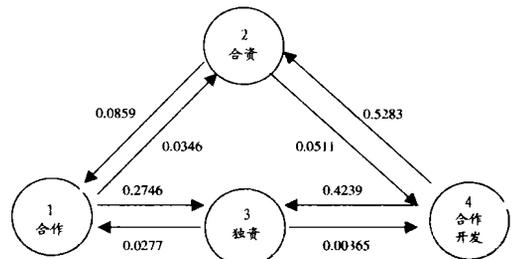


图 5 外国直接投资组成状态间的旋回图

由此旋回可以看到投资意向由合作开发向独资、合资形式的概率性转移,以及合作向独资形式、合资向合作形式的概率性转移。在旋回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独资形式是投资商投资意向转移的主要目的类型。这与上文中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旋回表示的是投资商对下一步投资时不同投资类型的倾向性,而不是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绝对数量。

我们以某年的实际利用外资组成比例作为一个行向量,与一步转移概率矩阵相乘,所得到的行向量,即为下一步(2 年后)的实际利用外资组成比例。按这一算法,用 1988-2000 年的实际利用外资组成比例分别推算了 1990-2002 年的预测组成比例(表 5)。该表中还附列了由 2002 年的预测值推算的 2004 年的实际利用外资组成比例的估计值。

由预测情况看,对实际利用外资组成的变化趋势的大致把握是可以做到的。另外也说明在这一时期内,一步转移概率矩阵基本上比较稳定而少有大的波动。这也说明该随机过程基本上是平稳的,换言之,亦即是“齐次”马尔可夫链。

$$\begin{bmatrix} 0.076 & 0.076 & 0.076 & 0.076 \\ 0.040 & 0.040 & 0.040 & 0.040 \\ 0.878 & 0.878 & 0.878 & 0.878 \\ 0.006 & 0.006 & 0.006 & 0.006 \end{bmatrix} \dots\dots\dots (4)$$



表5 由各年外国直接投资组成计算得到的一步(2年)转移后的预测组成

步数	年份	FDI 组成			
		合作 CJV	合资 EJV	独资 WFOE	合作开发 JDP
1	1990	22.33	57.73	16.44	3.50
2	1992	18.44	51.05	27.35	3.17
3	1994	18.66	48.61	29.80	2.93
4	1996	19.67	47.63	29.82	2.90
5	1998	18.38	43.91	35.02	2.68
6	2000	19.20	37.20	41.31	2.30
7	2002	15.32	31.74	50.91	2.03
8	2004*	14.46	29.00	54.63	1.90

说明: *200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组成是由2002年计算值推算出的。

将“一步转移概率矩阵”多次自乘,可以达到“稳态”[见式(4)]。这表示各类投资最终趋向的比重,合作约占7.6%,合资约占4.0%,独资约占87.8%,合作开发约占0.6%。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和产权制度的明晰,独资将最终占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地位。

四、成因分析

1.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发展变化

首先看1984年的这次“飞跃”,笔者以为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有了长足的进展:当年在原有的4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我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及3个三角洲。同时,海南被设为第5个经济特区。这使得原先仅为经济特区所拥有的优惠政策扩大到涵盖300个城市,面积42万平方公里,拥有2亿8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这一制度安排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外部利润内部化的强烈倾向。这种开放的力度使得制度变迁主体获得潜在利润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正是我国吸收外资第一次“制度变迁”的“非均衡”阶段,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法规、政策促使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这一速度便由于一系列制度安排步入“均衡”阶段而逐渐放慢下来。

与之相比,1992至1993年外资的“飞跃”式增长有着更多的政治因素。“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境外投资者认为中国的国门很可能因此而再次关闭,所以不敢继续将资金注入到中国。1989年和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微弱增长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以前各合同项目的发展要求使然。然而,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确定的基调以及之后“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使得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理直气壮起来。而其直接效果就是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了152%(当年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增长更是高达385%)。对于外商来说,这种制度层面上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可,意味着市场的规范及交易成本的降低已逐渐成为现实,因而又一次形成了获得潜在利益的契机。我国吸收外资的第二次“制度变迁”的“非均衡”阶段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框架的构建过程,随着制度框架日趋完善,制度的变迁逐渐进入“均衡”阶段。因而其过程对应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速度的由快到慢。

对于从1999年开始出现的“下滑”,众所周知,自1998年开始,亚洲特别是东亚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根据1979-1999年各来源地投资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比例排序,主要的亚洲国家及地区有:香港及澳门地区(51.50%)、日本(8.09%)、台湾地区(7.76%)、新

加坡(4.82%)和韩国(2.87%)。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到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近四分之三,而这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因此,从1998年之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我国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也重新达到468.78亿美元的高水平足以说明1999年的这次“下滑”只是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一个暂时现象!

2. 实际利用外资组成的转移变化

那么,这种比例上的巨大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各类投资随着我国吸收外资的“制度变迁”并因其产权特性等特质而出现的必然趋势。

例如合作制企业,其形式就比较灵活。首先,中外双方出资及利润分配皆可通过谈判以合同形式规定,出资内容可以包含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和自然资源使用权等各种可折算资产,但同时又并不强制性要求这些内容全部折算入双方的出资内容中。另外合作制企业对外方出资比例并无明确的下限。在利润分配方面,双方则按合同规定的比例进行。这些都为境外投资者以相对较低的风险获得较高的利润创造了条件。其次,合作制企业的管理相对灵活,可由第三方来管理企业,且对该方无严格的要求与限制。再者合作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这在与投资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的条件更具有现实性。以上这些特质都使得合作制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投资环境尚不够完善的条件下成为境外投资者的首选。

反之,独资企业则具有许多与合作制企业相异的特质:独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且投资方具有完全的资产所有权与管理自主权,原本应成为投资者的首选,但由于其对投资环境风险的高度敏感性,使得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少量资金“试探性”投向独资类企业。独资企业不像合作、合资企业那样:在国内拥有合作方,因而土地、厂房等不动产可以顺理成章地作为投资部分。基于同样的理由,独资企业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处理及对国内市场的了解等方面的不足也增加了其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这些特质使得独资企业在不完善的投资环境中具有较大的风险。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独资形式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比例一直很低。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投向独资企业的资金比例迅速增长并在2000年跃居各投资类型首位。而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境外投资者对于所有权的诉求。

相比之下,合资企业可以说是介于合作与独资两者之间的一种形式:与独资企业相比,由于拥有国内合作方,土地、厂房等不动产无需境外投资方购置,且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对国内市场的了解等方面亦不会处于劣势。与合作企业相比,它又具备法人资格,在投资环境的制度框架趋于完善时这一点十分必要。而且合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是按照双方出资比例进行的,且该比例要按照双方所有可折算资产的价值进行计算,比合作制企业的规定严格。基于这些特质,合资企业在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成为了一种具有“综合比选优质”的投资形式。因此,在这一期间其比例随着合作制企业比例的下降而上升并占据主导,之后又随着独资类型比例的上升而下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开发项目,虽然它的比例变化较大,但其实际利用金额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在1~7亿美元的范围内变动。合作开发项目的范围基本局限于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因单个项目投资数额巨大,所以在该领域具有开发实力的投资者并不很多。因而其年项目数量基本处于个位数,对应的资金额也基本维持在一个固定

的范围之内。而其比例的变化则主要是由于合作开发项目在出资构成及利润分配等方面与合作制企业类似,因而投向该类型的资金在早期亦占据了较高的比例。而到后期我国外资整体增长迅速而投向合作开发项目的资金基本不变,其比例自然大幅下降。

综合起来,从我国吸收外资的组成情况的变化来看,随着我国投资环境日趋完善、成熟,各种类型投资将根据其各自的产权特性等特质而占据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范围。

五、结论

本文认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两次“飞跃”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吸收外资的两次“制度变迁”使然,而1999-2000年间的下降则是一个由外部因素引起的扰动。文中建立了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时间序列数学模型,并指出该数值以负指数函数形式逼近某一饱和值,并最终呈现出“饱和状态”。若要使其重新大幅度增加、加速上升则需要有“制度创新”。

在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一系列对于市场规范及贸易规则的要求将使我国利用外资的制度变迁进入新的阶段: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12.4%,达527亿美元标志着“第三次制度变迁”的开始。这将是我国进一步开放并出台新政策的恰当时机。

我国利用外资组成的变化是各类投资随着我国吸收外资的“制度变迁”并因其产权特性等特质而出现的必然趋势。外商在4种投资类型中的投资意向转移大致上是一个齐次马尔可夫链,即平稳随机过程,将可以用转移概率来表征该过程。结果表明:由其他类型向独资类型投资意向的概率性转移是该过程的主流,这与实际趋势是一致的。

文中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建立了合作、合资、合作开发三种投资类型对独资类型的比值的时间序列数学模型,

从而对外商投资意向的长期稳态组成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独资最终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导类型。因此,国家在制定投资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程虹:《制度变迁的周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 李岚清:《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4. 罗积玉:《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及预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5. 外经贸部:《截至1999年对华投资前十五位国家/地区情况》,http://www.moftec.gov.cn/moftec-cn/tjsj/wztj/2000-09-22-12.html,2002。
6. 万耀青:《最优化计算方法常用程序汇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
7. 徐士良:《FORTRAN常用算法程序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8. 张五常:《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9. Chandler, Alfred D.,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0. Coase, Ronald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 pp. 1-44.
11. Jun, Fu, 2000. *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2.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3.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UNCTAD, 199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Q)

(上接第51页)2002年国内旅游总人数已达878万人次,总花费已达3878.4亿元。10年之内在此基础上翻一番,也是完全可能的。

10. 交通通讯消费。主要是小汽车消费。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量2002年为0.9,但发展很快,预计10年之内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家用汽车将达到20%,即现在珠江三角洲水平。到2020年达到5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达到20%左右,应该说是可能的。

此外,还有生态环境的指标(如城市人均绿地面积)以及公共文化设施、医疗保健等指标,10、20年之内,都会大大提高,得到合理的解决。上面这些指标及预期数字逐步实现了,就会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光荣任务。

注释: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册,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94、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文版,第2卷,5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⑫⑬⑭⑮《中国统计摘要》(2003),104及109、102~103、98及62、174~175、21及9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⑯⑰⑱⑲⑳《中国统计摘要》(2003),30、104、129、172、104、182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国际统计年鉴》(2001),9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卢中原:《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载《财贸经

济》,2003(4)。

郭克莎:《需求约束与效率约束》,载《财贸经济》,1999(9)。

余根线:《当前宏观调控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载《经济学消息报》,1999-10-29。

尹世杰:《关于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几个问题》,载《财贸经济》,2001(12);《提高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载《经济学动态》,2002(10);《再论积极鼓励消费》,载《消费经济》,2002(5)。

⑲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⑳杨连成:《我国的住房市场与住宅产业化》,载《光明日报》,2002-01-04。

㉑《北京房价仍然偏高》,载《中国消费者报》,2003-06-06。

㉒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2000),139、137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㉓孙文昌主编:《现代旅游开发学》,318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

㉔叶全良:《21世纪中国旅游发展新趋势》,载《财贸经济》,2002(2)。

㉕陈瑞光:《广东城镇居民消费趋势与启动对策研究》,载《南方经济》,2002(12)。

㉖温家宝:《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载《求是》,2002(3)。

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㉘《邓小平文选》,第3卷,145、39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㉙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32、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长沙 410081)
(责任编辑:S)